

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 先进文化

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先进文化

本书编写组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 京·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及其先进性	(1)
第一节 文化的概念	(1)
第二节 文化的先进性	(10)
第二章 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	(17)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	(17)
第二节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起点及其角色转换	(22)
第三节 “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特殊重要性及近代中国的“文化问题”	(27)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使命	(31)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5)
第三章 建国以来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	(41)
第一节 文化界的和平解放	(41)
第二节 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初步发展	(48)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	(63)
第四节 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政策	(77)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的成就	(93)
第一节	解放思想 拨乱反正 重建科学教育 文化发展的正常秩序	(95)
第二节	乘改革东风 文化事业向纵深发展	(104)
第三节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115)
结 语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及其历史 意义	(126)
第五章	国际文化冲突中的中国先进文化建设	(127)
第一节	全球化的文化景观	(127)
第二节	文化市场与人才的国际竞争	(131)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文化冲突	(135)
第四节	在冲突与挑战中发展中国先进文化	(142)
结 语	文化建设的新战略	(147)
第六章	国内文化矛盾中的中国先进文化建设	(150)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	(151)
第二节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境况与文 化理想的矛盾	(160)
第三节	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化矛盾	(173)
第七章	文化发展规律与先进文化建设	(184)
第一节	文化的内在规律	(184)
第二节	遵循文化规律发展先进文化	(188)
第三节	认真探讨准确把握文化规律	(195)
第八章	先进文化与现代传播	(199)
第一节	文化与传播	(199)

第二节	充分利用现代传播的优势推进先进 文化建设	(203)
第三节	大力发展现代传媒营造良好的传播 环境	(209)
	编写说明	(214)

第一章 文化及其先进性

第一节 文化的概念

自从党的十五大报告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并列起来谈，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要求进一步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摆在了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来，文化和文化建设问题越来越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热点。

然而，什么是文化？却历来是一个聚讼纷纭、见仁见智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晚期，A.L克罗伯和C.克拉克洪就曾搜集到了一百多个文化定义。其实，任何概念的定义，都不单纯是一个孤立的逻辑分析问题，它总是暗含着某种思维定势，暗含着某种之所以如此定义的范围更广、层次更深的一整套“范式”。因此，有关文化定义的各种分歧，除了这一概念本身在日常用语中的模糊性和歧义性的原因外，我们更多地要从定义者本人的不同的关注焦点、不同的考察前提和视角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来理解。为了使自己的文化立场有一个更清醒的自觉，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几种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

一、“大文化”概念

（参见W.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文化 (Culture) 一词来源于拉丁字 Cultura, 本意指耕作、培训、教育、发展、尊重等, 其他含义均由此引申。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于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它, 而并不觉得非要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不可。只是文化人类学正式创立后, “文化”成了该学科的中心概念, 按照现代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 就不能不对它加以界定。于是,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中第一次给文化下了一个明确而全面的定义。泰勒的定义是: 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按照这种“复杂整体”概念, 凡打上人的印记的一切都属于文化, 或者用 M.E. 斯皮罗的话来说, “在传统的观念里, ‘文化’是指除自然界以外的群体环境的所有方面和除生物学以外的人的所有方面。”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文化”概念, 它有时也被简化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 或者干脆说文化即“自然的人化”。

在中国古籍中, 最早把“文”、“化”两个字联系起来的是《周易·贲卦·彖辞》: “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人文”与“天文”相对, “人文化成”与天地自然的变化相对, 它主要指以传统的诗书礼乐中所体现的社会生活的根本法则和精神教化天下之人, 使社会变得文明而有序。这种“人文化成”的过程和结果, 不外乎“自然的人化”的过程和结果。尽管这一古老的概念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着历史的阶级的局限, 但在抽象的形式上其所指范围大致与现代的“大文化”概念相合。

参 见 W.A. 哈维兰: 《当代人类学》, 王铭铭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241 页

M.E. 斯皮罗: 《文化与人性》, 徐俊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 页。

就此而言，以“文化”二字对译 Culture，还是相当吻合的。

“大文化”概念的最大优点，就是从宏观上把“文化”与“非文化”的本质区别讲清楚了。然而，一旦把文化的外延扩大到人与自然的分界处，文化就成了一个无底洞，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永远也装不满。世界上又有什么东西与人无关呢？人与自然的界限远不像初看的那样分明。特别是在微观层次上，“大文化”概念常常与我们的普遍经验不尽相符。例如，我们通常只把社会群体共有的意识看作文化，而不把某个人头脑里偶然冒出的转瞬即逝的“古怪”念头看作文化，并不是因为这些念头是“非人的”。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框架，也许能为人们提供驰骋想象的广阔空间，但却未必适合脚踏实地的实证研究。因此。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文化人类学家们越来越倾向于大刀阔斧地打枝去叶，把文化概念限定在一个足以使内部各部分显示出内在联系的明确而坚实的基础上。在这种背景下，符号学文化概念最为引人注目。

二、符号学文化概念

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文化就是“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按照格尔茨的说法，“象征符号”是意义和概念的载体，是固化在可感觉的形式中的经验抽象，是思想、态度、判断、渴望或信仰的具体体现；符号的有序排列就构成了“文化模式”，正如遗传基因是生物体的内在信息源一样，文化模式是人的外在信息源，它为组织社会和心理过程提供了一个复制模板或程序，据此便可塑造公众的模式化行为；“文化”即是此类模式积累起来的总体。符号学文化概念

C.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109页。

一般把文化限定在精神领域，强调文化的符号化和公共性，其核心就是由符号系统所表达的、为社会群体所共享的概念和意义。

符号学文化概念提出后，很大程度上理顺了文化、社会和心理之间的关系。在“大文化”概念下，一方面社会生活和个人心理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三者之间又常常陷入简单的直线式层级关系：文化整体仿佛是最浅层的现象，社会结构对应着中层的实体，个人心理则构成了最深层的基础。于是部分与整体、深层与浅层、内部与外部的关系相互缠绕，乱作一团。符号学文化概念则使三者之间大体上呈现出外在的三边关系，大大增强了文化分析的清晰度和力度。在文化与社会之间，虽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仍可以是文化的符号，从中我们可以找出隐蔽在社会关系背后的文化规则，但文化的对象毕竟锁定在符号里的“概念”、“命题”和“意义”，“文化本身并不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或者说，社会的结构、组织、行为本身（非文化）毕竟不是它们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信仰（文化）。在文化与心理之间，虽然个人的心理活动离不开文化符号提供的内容，但文化只是“编入集体表征中”的意义系统，符号的意思“似乎‘处于’符号自身里”，文化本身并不包含个人的思想和情感，因为后者是个人的，“它们并未被编在集体符号中”；只有当个人接受、获得了文化符号的内容后，符号的意思才“处于”心灵里；只有当符号的内容转化为个人的信仰而“内在化”后，符号的意思才“活在”心灵里，个人才真正被该文化所化；不过，文化符号的内容在“内在化”的过程中，不但原有意涵有很大的耗损，而且会有多余含义产生在个人的心灵中。

三、与经济、政治相对的文化概念

参见 M.E. 斯皮罗：《文化与人性》，徐俊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5—39 页。

我们的文化概念，主要指与经济、政治相对的文化概念。不同于包括人类社会全部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在内的与自然相对的“大文化”概念，它只限于精神现象的领域；也不同于把符号系统从全部社会现象中抽离出来的与社会和心理相对的符号学文化概念，它把经济、政治或文化都看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按照符号学文化概念，“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Power），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得到可被人理解的……描述。”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也就是说，这样的“文化”本身并非改变世界的力量，而只是解释世界的模式。我们的文化概念则不然，文化与政治、经济一道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文化不仅是经济、政治的反映，而且有力地推动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因此“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对这个与经济、政治相对的文化概念作一简单说明。

（1）文化主要指人的精神生活，也即人们满足精神需要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文化与经济、政治明显不同，因为经济和政治主要针对着人的物质需要——经济针对的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物质利益，政治针对的是以阶级或集团为单位的物质利益，而文化针对的主要是人的精神需要。人的精神需要有多层次、多方面，如求真的需要（科学、知识）、求善的需要（道德、价值）、求美的需要（文学、艺术）、求安的需要（习俗、宗教）等等。文化就是人们

C.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8、5页。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为满足这些精神需要而进行的活动及其结果。当然，就人而言，并不存在脱离物质需要的精神需要，也不存在脱离精神需要的物质需要。只有纯粹物质需要的存在是“物”，只有纯粹精神需要的存在是“神”；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在任何时候都包含着精神追求，而推动这一实践活动的物质需要在任何时候也都浸透着精神作用。社会生活本来是一个整体，不可强行区分所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人的需要也是一个整体，不能把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绝对割裂开来。这里，严格的区分只能在思维中进行，现实中的区分总是相对的。因而，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划分，并不是像三个苹果那样彼此分离。经济和政治活动必然包含着某些精神需要及其作用，当我们检讨这些精神需要及其作用时，实际上已进入了文化的领域。根据这种文化定义，我们可以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归纳为“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指更狭义的文化）”两个方面，而把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定位在“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狭义）、有纪律的公民”，其中：“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文化建设的“根本”或“中心环节”；“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等等。

（2）文化的核心是符号化的、公共性的意义系统。文化是社会性的精神生活，而不是纯个人性的精神活动。社会性的精神生活是交往的产物。人们在交往中满足精神需要，必须通过特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殊的中介才能实现，这个特殊中介就是广义的“符号”。符号是固定、表达、传递、接收意义的工具。符号是群体共有的观念和意义的载体，但也可以被个人赋予某些独特的含义。文化只指涉符号系统中为群体所接受的共同观念、思想、情感、态度、意志、判断、理想和信仰等内容，不包括个人附加在符号中的独特内容。然而，当个人附加在符号中的新内容或个人创造的新符号被群体所接受时，它们就被纳入文化之中而成为其一部分了。这正是文化可以跨越历史长河持续积累、发展并不断获得新生的活力所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符号，但文化符号可以是任何东西，例如人的一举一动，或自然的一草一木，只要它们得到群体的认可，就可以作为符号传达某种文化意义。意义，永远是文化的灵魂。人们追求精神的满足，说到底就是想要获得某种意义。邓小平同志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经济的意义，只有在更大的范围内才能理解。例如，成功的经济可以巩固政权，可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坚定我们战胜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等。正是经济以外的目标，特别是涵盖一切领域的最高理想，才能为经济建设乃至其他一切工作提供明确的坐标或参照系，在这个坐标或参照系中，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才获得了确定的意义。这里，理想和信念构成了意义的内容，而经济工作则成了表达意义的符号。社会风气变坏，意味着理想和信念的动摇和失落，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意味着意义的内容没有被经济活动这一符号所表达。经济虽然成功，但意义却丧失了。丧失了意义，等于丧失了文化的灵魂。可以说，文化是意义之网，人依靠它才能直立；文化是充满意义的大气层，人在其中才能呼吸。所以，建构意义是文化行为的本质特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

(3) 文化也是一种力量。文化之所以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文化是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方式，直接由精神需要的推动而发展。正如物质需要推动着人们发展出种种本质上属于物的力量形式一样，精神需要推动着人们发展出种种只属于人的力量形式。一般说来，政治的力量是通过垄断暴力而展示出来的，经济的力量是通过占有财富而产生出来的，文化的力量则常常通过知识和信仰而表现出来。经济、政治力量都是物质性的力量，文化力量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性的力量。然而人的需要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一方面精神需要是物质需要的延伸，并且归根结底为物质需要所决定；另一方面人的物质需要本身就渗透着不同程度的精神需要，并且正是在精神需要的作用下才呈现出无止境的增长趋势。相应地，人的社会力量本来也是一个整体，由物质需要的推动发展出来的经济、政治等物质力量，一开始就被符号化了，一开始就包含着文化的意义；而由精神需要的推动发展出来的文化的精神力量，则总是会以某种物质形式表现出来，并且总是会融入或者转化为经济、政治等物质力量。因此，我们理解文化力量，既要深入其精神性的本质，又不能抛开其物质性的表现和转化形式。文化的力量首先表现在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全方位的规范、激励和安顿的作用上，其次表现在对社会物质生活的深层次的整合和推动的作用上。在文化力量的各种表现形式中，有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其一，“知识就是力量”，邓小平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充分表达这方面的意思；其二，信仰就是力量，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前者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后者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总之，我们的文化概念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其主要内容与精神文明一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大体说来，文明与“大文化”概念相当，精神文明与我们的文化概念相当。但相当并不等于没有差别。就“大文化”概念而言，文化包括“自然的人化”中所有积极的和消极的内容，而文明则主要指“自然的人化”中积极的一面，因此文化与自然相对，而文明仅与野蛮相对。就我们的文化概念而言，文化包括精神生活的全部内容，而精神文明则专指精神生活的积极方面。当然，如果二者同时加上“社会主义”的限定，在通常的用法中，“社会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几乎同义，惟一的差别只在视角的不同，即前者与经济、政治相对，而后者与物质文明相对。由于我们的文化概念并没有排除精神生活的消极面，所以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讨论文化的先进性问题。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144页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第二节 文化的先进性

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要求，把如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一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这是一个决定当前文化建设总方向的大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先进文化？衡量二种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或者说，如何理解文化的先进性？

一、文化先进性的含义

我们说的“先进文化”，是指“社会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对立面是社会上存在的一些“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社会上还存在一些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落后文化，甚至还存在一些腐蚀人们精神世界、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腐朽文化。”所谓先进、落后或腐朽，是对各种文化或各种文化因素的性质的判断。针对不同性质的文化或文化因素，我们的态度不同：先进的，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发展；落后的，我们要努力批判、改造；腐朽的，我们要坚决抵制、铲除。

然而，文化先进性的一般含义是什么？乃至文化有没有先进性？“先进”无疑是一个正面的价值判断，并且是高度的正面肯定，它一般是对“进步”范围内的“先锋”或“前沿”部分的形容。如果把“先进文化”理解为时空不同的各文化中比较而言发展水平最高或发展结果最优的文化，那么，文化的“先进性”就

江泽民：《在庆祝建党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是指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的那些必要条件或根本性质。在今天，“先进性”观念总是与进化论思想联系在一起。进化论者认为，人类历史进程存在着普遍的发展规律，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沿着统一的进化方向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独立平行地进行的，所有文化如任其自然都将依次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因此各种独立发展的文化之间的发展水平是可比的，并且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是当时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其他各种文化可以根据与它的差距大小确定其所达到的不同进化程度。这样，文化的先进性获得了宏观历史背景的有力支持，同时也获得了时代性的附加含义，先进文化就是指特定历史时期发展水平最高、最能体现时代要求的文化。

对文化的先进性概念提出直接挑战的，是文化相对主义理论。文化相对主义是在与古典文化进化论的较量中发展起来的。古典文化进化论片面强调社会进化的单一性和直线性。忽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带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色彩。文化相对主义以新康德主义哲学为后盾，强调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不存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历史和普遍法则；强调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系统或意义系统，它们是由传统习惯及其相伴情绪积淀而成，并非由理性思考而得，因而是不可比较的；每个文化都根据自己最终的价值观和目的建立各自的合理化标准，从一种观点看来是合理的，在另一种观点看来可能相反；各种文化之间没有优劣高低之分，不能以一种民族文化的价值观为标准去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按照这种观点，文化间根本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上根本不存在先进性的问题。应该说，文化相对主义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在反对欧洲中心主义、重视文化的民族特性等方面，对我们是颇有启发的；它还提醒了我们，先进与否毕竟是一个理性的标准，在情感等非理性领域里，应用时须慎之又慎。但这一切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进化论的基础，也不

足以从整体上动摇文化先进性概念的合理性。如果顺着文化相对主义的逻辑发展下去，不仅会否定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否定文化间相互评价、相互比较的可能性，而且必将否定文化间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可能性。因此，尽管文化相对主义的各种改良版本不断推出，但它们仍然逃避不了新文化进化论者和其他试图寻求人类基本共识的人们越来越彻底的批判。

二、文化先进性的标准

首先，从文化内部来看，一种文化之所以比另一种文化更先进，关键在于前者总体上比后者更“合理”，或者说前者总体上具有更多的“合理性”。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韦伯的说法，把合理性分为两类：一是形式上的合理，一是实质上的合理。由于前者要用在技术上是可能的计算来表示，而后者要用价值合乎理性的观点来衡量，所以我们姑且把它们分别称为“技术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或者简称“技术标准”与“价值标准”。

技术合理性主要与既存事实相关。在行为方面，当可以预期的目的被确定后，手段与目的、目的与效果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被估算出来，因而它们也在技术合理性所考虑的范围之内。从这个角度看，科学文化之所以比巫术文化先进，是因为前者更合理：尽管二者的目的都是要将某种盲目的自然力量纳入人的控制之下，但巫术把未知的自然力量想象成某种超自然力量所为，并企图通过求助于特殊的咒语和仪式迫使超自然力量听命于人的主观意志；而科学则是要去掉神秘的超自然力量这一中介，直接把握事物之间逻辑的和因果的联系，使未知变成已知，以便能通过改变某些自然条件来达到控制按规律运行的自然力量的目的。由于巫术对制约着事件先后次序的特殊法则之本质的看法是主观的错误的，

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6—107页